

《史匯》
第二十六期，頁 8-15
2024 年 8 月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評介洪長泰著、麥惠嫻譯，

《染紅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

Hung, Chang-Tai. *Politics of Control: Creating Red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ranslated by Wai-han Mak.

徐政宇*

書 名：《染紅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

作 者：洪長泰著、麥惠嫻譯

出 版 地：新北市

出 版 社：聯經出版社

出 版 日 期：2023 年

頁 數：394 頁

洪長泰長年潛心於發掘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中共如何在人民生活之中植入社會主義、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這樣的操作在建設新中國時代代表什麼意義？並為人民帶來什麼作用？如早期著作《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運用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徑，舉出漫畫、說書、歌曲、報紙如何反映中共的新政治文化。¹《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以「空間政治」的角度，分析中共如何在建國後規劃、執行北京城的改造，以空間布局樹立高度的政治權威，展現社會主義大國的新氣象。²《毛澤東的新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治文化》觀察中共如何以慶典、圖像、紀念儀式及歷史的改造與重構，鑄造屬於毛澤東（1893-1976）的新政治文化。³

*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¹ 洪長泰著，《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臺北：一方出版，2003）。

² 洪長泰著，《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

³ 洪長泰著，麥惠嫻譯，《毛澤東的新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治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9）。

環觀洪氏的多本著作，雖是研究中共政治，卻與傳統政治史有所區別，運用許多非文字資料，徹底實踐新文化史的取向，並運用不同概念描述中共的眾多統治技術，提出許多耳目一新的見解。

2023 年由英文譯成中文出版的《染紅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⁴，作者同樣發揮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將北京作為焦點，運用禁書、報紙、民間教派、文化館、幼兒教育、政治公園以及民族文化宮，觀察中共如何透過這些建設樹立政治文化，並以此進行宣傳。另外，現行不少研究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黨和政府上下緊密合作的集權主義黨國體制，並透過這樣的政治模式達成消除個人意志與活動空間的「極權主義」。然而，作者以七個案例描寫出中共文化政策的實踐過程中，反而有政府機關上下不同步的狀況，刺激我們思考集權主義黨國體制的異音，以及「極權主義」分析範式存在著對個人能動性的盲點。更進一步的，此書以「控制政治」的角度，闡述中共創建文化制度的過程，及其後續如何達到人民身心由外而內的控制，將中國染成屬於中國共產黨的紅色。此書從宣傳制度的建立、中央到地方的層級、七面向的宣傳管道到人民受到的影響，從生產、輸出至接收的一條龍式書寫，讓讀者能從制度運作的深度，以及多樣宣傳媒介的廣度瞭解「新中國」的宣傳與控制。

此書導論的第 30-43 頁中，已有七個章節的提要，相當簡潔扼要，筆者不再畫蛇添足，另闢段落簡述各章內容。相對的，筆者試圖換一個方式介紹此書，將這七章的順序打散開來，從問題意識的方面進行歸納整理。筆者認為此書的主軸除了作者所說的中共建國後的新政治文化、宣傳以及控制政治外，若從文化控制的達成手段進行切入，或許能有另一種的眼光認識建國後的中共宣傳。比如說：

第一章：文化警察與北京禁書

第二章：審查及整肅都市報：《北京日報》

第三章：打擊民間流行教派：一貫道與群眾運動

第五章：把孩子染紅：改造中國幼兒教育

以上四個章節討論禁書、民間宗教和報紙、幼兒教育，前二者是傳統中國已有的現象，而後二者是現代化後在中國建立的。筆者認為這四面向在中共的視角中，均為舊社會中的事物，建國後必須對此加以「查禁」，同時結合社會主義、民族

⁴ 英文版最先發行，可參見 Chang-Tai Hung, *Politics of Control: Creating Red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21).

主義價值將其內涵「改造」為新政治文化。而剩下的三章：

第四章：文化館：遍布基層的宣傳網

第六章：政治公園：公共空間用作宣傳舞台

第七章：建築與民族：團結在同一屋簷下？

文化館、公園及民族文化宮都是中共建國後興建的建築，亦即中共透過國家力量「創造」具有新政治文化的新事物。因此，作者闡述中共的七面向控制，蘊含著中共建國後創立的制度之中，有「查禁與改造」和「創造」的兩個軸線。可見中共的統治技術是具有層次性的，此二者雖路徑不同，卻共同為創建文化制度提供力量。

世界上各個政權均會對被統治者進行宣傳以及政治控制，中共也只是其中一個而已。因此，當我們看到中共運用各種技術達成宣傳與控制的歷史現象時，仍得思考他們之所以進行這些動作的動機，以及專屬於中共的特色是什麼？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中共要透過打造具有規模的制度達到控制社會，甚至實踐革命理想。如欲觀察中共的特色，筆者認為得將觀察的錨點放回中共建國當下，將當時視為圭臬的社會主義以及階級鬥爭重新帶入討論當中。文後將分成「制度史與人的能動性」、「建國後中共宣傳的蘇聯因素」、「宣傳的效度」、「研究作為過去與現在的橋樑」以及「一些待商榷的疑問」等五個部分，進一步討論中共為什麼要進行文化控制？這些統治技術是要達成什麼目的？而我們又該如何認識之？本文僅以一得之見提供讀者一種閱讀此書，或是認識中共宣傳的思考模式。

一、制度史與人的能動性

作者不以抽象理論建立論點，運用制度史的實證研究方法說明中共透過政治權力創造遊戲規則，上至政府下至人民都得依循之，呈現「新中國」並非雜亂無序的達成此七面向的控制；相對的，人們也是陷入中共擘劃的制度之中，只能照規則行事。制度固然形塑一個框架，但它還是由人們運作的，人的能動性和不可預測性可能使制度的運行和設計時的構想產生差異。如禁書制度，審查員依照原則辦事，卻因個人判斷使得放行與否在不同人之中有不同結果，甚至因為身處的政治氛圍和最高層的政治風向歧異，出現審查時的不一致結果。尤其審查員腦中的意識形態準繩相當難以精準定義，如「什麼是中共的原則？何謂民族主義價值？何謂反動政治思想？」這些模糊不清的意識形態碰到審查制度中的懲罰規訓時，使得審查員不敢犯錯，促成他們裁定傾向嚴格，不允許任何可能觸碰禁忌的可能；

並且，也可能因個人不是理解「正確」版本——難為人知的中共高層旨意——而誤判。這種政治路線、制度與人員的交疊作用，見於大躍進時期《北京日報》報社的報導傾向，此時政治路線極度不穩定，尤其中央的指示又有含糊不清的「方向性」、「反官僚主義」等字詞，使得這些報社人員感嘆緊跟著黨走實在困難。

此書呈現文化制度形成、運作的過程，並且人在制度之中的活動是清楚的。可能礙於材料，難以呈現審查員或報社人員的具體面孔，使得我們只能從當時的政治風向，判斷這些人員為什麼做出這些處置。如果多加生動描繪審查員、報社人員的來歷，就能以他們的經歷或大致的思想樣貌，判斷為何在某個關鍵時刻禁止／放行這些著作。材料問題是非戰之罪，目前中共檔案難以取得的情況下，從行文中可見作者已經對材料盡最大的努力。然而，作者也提供一些線索，仍可思考「人的能動性是來自於個性及經驗，那這些個人主觀因素如何影響制度的運作」的這個大哉問。人並非被制度壓的一面倒而已，反而是具有和制度互動的主動性，存在能夠不斷地向黨試探的可能，如「紅線問題」（頁 121）跟「制度」的設想可能有所出入。過往對「制度」的想像，是預設的、高度穩定的設計，是中共明確設下的「一成不變的紅線」。作者描述的審查制度運作過程中，所謂的「紅線」是只要報社人員多加學習黨的理論，天天跟政治禁區打交道的情況之下，總會找到在撰寫報紙時不會犯錯的安全領域。對此，所謂的中共政治禁區——「紅線」是有「一成不變的紅線」以及「與紅線跳舞」的層次。

作者的書寫讓我們思考「人 vs 制度」的辯證邏輯關係，對筆者來說更需要放在心裡思考的要點是：人的能動性是毫無邊際的嗎？不斷試探的狀況下就能擴充制度限制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中，人們只能在中共設下的條條框框中活動，能動性或許有其極限。就算展現有能跟中共討價還價的本事，卻無法逃脫毛澤東擘劃的框架，也難以改變中共專政的本質。

二、建國後中共宣傳的蘇聯因素

1949 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著兩個 DNA，⁵一是中國化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二是「一邊倒」之下的蘇聯因素。關於後者，經過學界的長期耕

⁵ 所謂「DNA」的觀點，來自於石川禎浩的解釋：中共具有兩個 DNA，一是共產國際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一是毛澤東。雖然筆者的討論是從 1949 年之後開始，但這兩股 DNA 也貫串其中，因此引用石川氏的解釋展開後文的討論。石川禎浩著，瞿艷丹譯，《中國共產黨百年史：革命、開放到專政，共產黨特質的世紀追尋》（新北：臺灣商務，2023），頁 205。

耘，討論中共建國初期受蘇聯因素影響的成果斐然，⁶此書則同樣在關注蘇聯因素的研究脈絡當中。作者點出國家的行政制度中有蘇聯專家的位子，但中國官員卻非將蘇聯專家意見照抄而行，他們可以選擇適合中國社會民情的部分加以改造並應用，點出「一邊倒」之下中共仍有自主性。筆者認為新中國如同蘇聯是一「宣傳國家」⁷，中共運用國家權力將政治伸入社會文化、人民生活之中，達成控制的目的。這種說法具有「國家 vs 社會」的格局，如作者認為公園應該是公眾共同享有的空間，但在中共的介入之下，成為政治展演的舞台，壓縮人民的私有生活。這種說法可能遺忘中共建立公園的預設立場。新中國的一切都要符合社會主義價值，成為形塑、改造新人的媒介，如此一來公園「必定」具有政治功能，是教育人民的場所。因此，中共的立論基礎與西方論述中的公園迥異，具體地說，染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紅色公園，才是真正屬於人民的。

此外，若從「宣傳國家」的範式出發，中共大力抓緊制度與官員，似乎政府上下皆戮力同心向人民宣傳。然而，文化館的案例卻發現宣傳工作有人手不足的狀況（頁 194）。中共跟老大哥蘇聯相比更沒運用血腥鎮壓，搬用延安整風經驗推行全國，使人民跟著黨走。不過，對於建國初期的中共來說，宣傳工作與生產工作在行政資源有限的狀況之下，看似癡心於宣傳的中共，或許仍存在有心無力的狀況。這種狀況或許能對「宣傳國家」的想像具有一定程度的反思。

三、宣傳的效度

如何評估宣傳是怎樣影響人民，並且力度有多深刻？不論是方法或材料上都是個難解的大哉問。對此，作者試圖以實證解釋宣傳的作用。如位於首都的民族文化宮，它宣傳的目標群眾是邊疆民族還是城市居民？對前者而言，可能僅有少數人能參訪北京，大多數人是透過其他宣傳媒介瞭解首都建有屬於他們文化的地方，因而體認到黨是將他們放在心中。相對的，中共可藉由民族文化宮使後者瞭解新中國的疆域遼闊與文化厚度，並且一切最終均歸於黨的統治。但是，毛澤東時代的宣傳有強大作用，並非因為中共運用標誌性的建築，就能攏絡邊疆民族並

⁶ 可參見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李華鈺編，《中國學習蘇聯（1949 至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9）。余敏玲，《形塑「新人」：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⁷ Peter Kenez 以蘇聯宣傳的歷史形成「宣傳國家」的概念，強調國家運用權力將意識形態灌注於大眾文化當中；中共建國初期的行動，或許也能運用「宣傳國家」進行分析。Peter Kene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7-19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教育城市中的漢族。反而是中共靈活運用人民在生活中會接觸到的一切媒介，灌注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於其中，使人民沉浸在「新」的氛圍改造成新人。從宣傳層面來說，人民之所以追隨中共的關鍵在於中共壟斷人民獲取資訊的管道，並讓這些管道只有一種聲音，亦即社會是單向度的⁸。就算人民具有思考的能動性，相信自己有改變世界的力量，卻也只是在一定框架中活動。

現在我們能夠發現政治宣傳的破功之處，在於我們能夠掌握更多資訊，證明統治者說的跟做的不一樣，講的跟現實有所出入。作者從幼兒教育談起改造社會主義新人，可能高估幼兒教育對人的發展可能性的拘束。如果換一個角度思考作者闡述的幼兒教育，則可能是：作者對幼兒教育的討論顯示中共在教育制度的用力之深。同時，輔以其他研究成果，就能呈現中共對各級教育課程都控制在手，只有單一口徑的內容輸出，加上當時資訊不流通，形成人們只能聽黨說話的歷史圖像，因此宣傳的作用是相當大的。宣傳之所以有效，重點或許在於中共從幼兒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使得人們的成長、生活過程中處在資訊不流通的社會裡，不需要多方溝通，只要相信黨就好。作者強調中共宣傳強壓在人民之上的專斷與蠻橫，宣傳或許有另外一面向：中共透過國家力量將社會形塑成一個使人民易於導向某個思考模式的過程。

四、研究作為過去與現在的橋樑

綜觀此書，作者不僅研究中共建國之後的文化政策，更心繫當代中國的狀況。每章接近尾聲時都會提及七方面控制是如何延續至今，尤其是民族主義如何在現今北京當局的控制之下日益擴大。這種論述方式將今日的政治控制與民族主義搭起時光橋梁，七方面控制是中共佈置民族主義大旗的其中幾個媒介，並且無一不合民族主義掛勾。不過，建構民族主義可能只是中共意識形態的其中一條思路。作者的書寫中可見，中共取締一貫道時，也要求人民稱揚社會主義，必須將迷信思想拋棄。作者也凸顯取締一貫道是在「鎮壓反革命」下進行，其中的「敵人」被打為國民黨特務、日本特務、地主、惡霸、會道門首時，黨的判決不純以其中一項罪名為據，反而是交織在一起，敵人會身兼數頂帽子，使得難以判別每個案

⁸ 雖然馬庫塞關注二戰過後，歷經生產力復甦的資本主義社會，但「一個單向度的社會造成單向度的人」的概念卻仍相當有啟發性。尤其是在只能有一種口徑的中共統治下的社會當中，人們看似在其中具有能動性，或許只是在一個框架之中的施展而已。馬庫塞（Herbert Marcuse）著，劉繼譯，《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臺北：桂冠圖書，1990）。

主是否單純為一貫道而被鎮壓。就此而言，取締一貫道是鎮壓反革命的一條支流，鎮壓反革命又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體現。作者欲以一貫道接連提到 1980 年代的取締法輪功，可能只能從鎮壓宗教的現象而將兩者相提並論，但若討論一貫道的問題，筆者認為毛時代的社會主義、階級鬥爭可能是更須考慮的環節。

作者欲將七方面控制跟現在中國狀況有所呼應，以今論古的呈現方式可能有意識地加強中共的民族主義色彩。相對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共也有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核心，只是現在中國不講階級鬥爭，使得以古論今時階級鬥爭的存在卻消失了。民族主義與階級鬥爭在中共的意識形態當中不是二元對立問題，而是並行的雙主軸。作者或許能特別說明民族主義的色彩於今日依舊可見，但當毛時代的階級鬥爭消失後，這七方面原有的社會主義因素又如何轉換？另外，毛時代的政治狀況也非單純的，其實有山頭林立的鬥爭狀況。如作者數次提到當文化政策遇到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政治鬥爭時，機關呈現左右為難的狀況，卻可能礙於篇幅而無更多發揮。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略過數十年的發展，並將討論延伸至當代時，只特別突出今日當道的中共民族主義。作者對於階級鬥爭問題以及毛、劉鬥爭的線索少有解釋，可能使民族主義的切面過重，少了毛時代的社會主義核心。

五、一些待商榷的疑問

1960 年代西方史學界在馬克思主義與年鑑學派的研究脈絡之中，醞釀出「文化的轉向」，出現新史學——新文化史——的討論。⁹對臺灣學界來說，這種關注非文字資料、注意人群活動的新史學，在 1990 年代開始討論。¹⁰時至今日，這種「新史學」已不再那麼地「新」，隨著時間發展，已成為歷史書寫者廣泛使用的方法。以當代史學史的角度來看，洪長泰也是在二十世紀末新文化史的學術脈絡中，書寫出不少重要著作。在作者的學術生涯中，曾用空間政治、政治文化或是控制政治對中共宣傳進行詮釋；同時，也擴展很多的中共宣傳管道，形成深且廣的歷史圖像。有些文章內容雖有所更動，同樣的研究對象卻先後有用不同方式進行詮釋，難免有重複之感。

回歸到本文開頭，中共具有「查禁與改造」和「創造」的兩條路徑，但中共為什麼要如此運作？作者的說法是毛澤東欲徹底控制人民，因此插手修改並打造新的圖像、象徵、建築等面向。任何政權均會從圖像、象徵、建築建構統治者權

⁹ Hunt, Lynn (ed.), 江政寬譯，《新文化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頁 21-47。

¹⁰ 杜正勝，〈什麼是新社會史〉，《新史學》，卷 3 期 4（1992），頁 95-116。

威或國家意象。或許得點出中共跟其他政權不一樣之處在於「社會主義」與「階級鬥爭」，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從無隱瞞自己打造社會主義國家的念頭，而且在建國初期有強大的蘇聯因素存在。這些歷史經驗是其他政權所沒有之處。此書以新文化史觀察各面向，雖有不同詮釋方式，最終可能只描述一套中共控制、壓制人民的邏輯；並且以當代關懷出發反思歷史，可能放大民族主義，少勾勒毛時代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由此言之，或許相關討論仍存在可進一步發揮之處。

總體而言，作者充分運用七方面的各種資料，成功地為建國初期的中共創造紅色文化的過程提出制度史、宣傳以及控制政治的分析角度，同時也強調蘇聯因素對中共的影響。此外，此書雖由英文翻譯而成，仰賴翻譯者的才學以及作者本身的用字，使得行文流暢淺白，就算無先備知識也能瞭解建國初期中共的文化政策。筆者才疏學淺，斗膽提出幾個問題向作者及學界討論，並有拋磚引玉之期待，希望能有更多前輩共同討論中共史的相關問題。最後，筆者再次推薦洪長泰《染紅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相信讀者能藉此書看見建國初期中共宣傳的歷史面貌，以及當今中共政治宣傳的歷史因子。